

一个苏南乡村的治理之道

张家港永联村调查

YIGE SUNAN XIANGCUN DE ZHILI ZHIDAO
ZHANGJIAGANG YONGLIANGCUN DIAOCHA

高峰 马德峰 王俊敏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系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一个苏南乡村的治理之道

——张家港永联村调查

高 峰 马德峰 王俊敏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苏南乡村的治理之道:张家港永联村调查 / 高峰, 马德峰, 王俊敏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 - 7 - 5672 - 2355 - 4

I. ①一… II. ①高… ②马… ③王… III. ①农村—
群众自治—调查研究—张家港 IV. ①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1410 号

书 名: 一个苏南乡村的治理之道
——张家港永联村调查

著 者: 高 峰 马德峰 王俊敏
责任编辑: 周建国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宜兴市盛世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54 千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355-4

定 价: 4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序 言

工业化、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经济的主要表征，大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形貌。自 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51.27% 开始，可以说城镇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形态，乡土中国正在快速转变为城镇中国。截至 2017 年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 58.52%。然而，由于幅员辽阔，人口总量巨大，所以中国目前乡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依然庞大，乡村社会依然在变迁的过程中以多种形式广泛存在，并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对整个社会体系的运行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乡村社会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不应该）退出人们视野，乡村社会研究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领域，而应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历史地看，乡村治理由来已久。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体制环境下为了应对不同的治理需求，也存在着有差别的治理模式。特别是在近代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下，一些乡村的衰败乃至解体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乡村治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整体性的社会困境，一些改良形式的乡村治理或建设均收效甚微，甚至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基础结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我国的乡村治理才迈进了新时期。但是，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造成了乡村治理的一些困境，最为突出的就是乡村发展迟缓，贫困现象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发展很快，人民生活在整体上得到显著改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确立以及劳动就业的市场

化、乡村社会的非农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发展的不均衡等，日益凸显了乡村发展与治理之间的矛盾，使得乡村治理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开展创新性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提供了新背景，也提出了新任务。乡村治理如何与时俱进、转型升级，就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议题。如何加强国家顶层设计与基层自觉行动相结合，如何重视市场经济元素作用的发挥，重视乡村自身的基础结构和潜能挖掘，并将落脚点定位在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家园共同体的社区建设上，开创乡村社会治理新局面，推动乡村社会新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苏州大学高峰教授的研究团队受有关部门委托和领导，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一个苏南乡村的治理之道：张家港永联村调查》，正是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尤其是其聚焦于乡村治理与乡村发展的关联，更加凸显了课题的普遍意义。

该书作者将苏南经济发达地区永联村的治理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个案分析的方式，通过实地走访和观察，广泛收集资料，试图探索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乡村发展历程和治理之道。全书按照治理领域进行架构和安排，主要就村庄政治、集体经济、社会事务、社区文化、生态环境、基层政府服务供给等内容予以展开描述，展示了永联村所走过的工业化引领，带动城镇化，进而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其中，把十多年来村民实现集中居住，村庄体量变大，成为超级村庄这一阶段作为重点，围绕村民的需求转变和乡村治理面临的各种难题，在认真进行“把脉”会诊的基础上，梳理归纳出一些乡村治理的“良方”对策，并分别从政府、“乡能”、村庄自组织、村制民约四个方面，总结提炼出永联村发展和治理协同背后的“机理”，即基层政府是乡村治理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与制度供给的保障；乡村精英运用周边资源和个人魅力，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规划者和执行者；村庄自组织的发展，能有效促进乡村社会的整合协调；乡村制度规范的建设，规定了村庄治理行为的维度，发挥着约束与激励的作用……探索永联村发展和治理的

协同演进之理，正是该书作者的努力目标，相信他们的努力也会给予读者以启示。

当然，该书也有值得讨论和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以治理领域作为基本框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其他治理要素的研究。在表达方式上，总体叙述比较丰富和具体，融分析于叙述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强化。更好地处理诸如此类的关系，有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贡献更好的成果。无论如何，关注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促进发展与治理的协同演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方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们期待在作者与读者的深入互动中，不断加强该领域的研究，促进更多更好的治理实践，共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开创中国城乡关系的新未来，同时也贡献于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洪大用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目 录

●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视角	3
第三节 研究设计	7
● 第二章 发展历程与治理演变	15
第一节 村庄发育——村政联治	15
第二节 村庄工业化——村企合治	27
第三节 村庄城镇化——多元共治	34
● 第三章 集体经济	44
第一节 集体经济组织	44
第二节 集体资产的确权和经营	54
第三节 集体经济利益分配办法	69
第四节 信任与监督	73
● 第四章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80
第一节 现实诉求与政府职能转型	81
第二节 乡村合作共治的实践探索	85
第三节 实践价值与未来走向	96
● 第五章 社会事务	102
第一节 社会事务的“问题”扫描	102
第二节 社会事务的治理	106
第三节 社会事务面临的治理挑战	125

● 第六章 社区文化	129
第一节 社区文化导入	129
第二节 社区文化供给及其运作探索	133
第三节 社区文化治理的困境及应对	155
● 第七章 村庄政治	159
第一节 革命话语下的永联村政	159
第二节 改革浪潮下的永联村政	162
第三节 工业涌动下的永联村政	167
第四节 民主实践中的永联村政	170
● 第八章 美丽村镇	179
第一节 人地关系演进与区域功能规划	179
第二节 清洁工业：永钢	183
第三节 生态农业：永联现代农林基地	193
第四节 绿色居住：永联小镇	207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213
第一节 乡村治理中的国家	214
第二节 乡村治理中的“乡能”	217
第三节 乡村治理中的组织	220
第四节 乡村治理中的制度与规范	224
后记	230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在其经典著作《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指出，“10 亿~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较之工业的高速增长，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铁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①。D. 哈列维将这种转变定性为“历史的加速”，为了把变化导入社会体系的自身运转，社会的整体配置被根本改变，一种静态的或几乎静态的平衡被一种动态的平衡所取代，从而造成连续的不平衡。剧烈的转变常常会导致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城市数量和城市居住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乡村社会出现衰落解体，传统意义上的“小农”走向终结。

当然，上述转变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乡村生活的城市化，走向集镇社区发展之路，即改变农民旧有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变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使农民变为居民，从传统人过渡到现代人，通过就地转型的方式推动当地城镇化发展，城乡之间差别趋于消失。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指出：“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② 比较而言，后一种

①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 [M]. 李培林,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1-6.

② 埃比尼泽·霍华德. 明日的田园城市 [M]. 金经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7.

转变可能更加符合农村人口比重过高的东方社会国家。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70%左右，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基础地位，这使得国家无论怎么推进城市化，现有城市无法吸纳众多乡村剩余劳动力，今后几十年内仍然会有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故亟须转化思维将农村建设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让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过上类似城市的便利生活。在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转变已在加速进行。其典型例子之一就是苏南地区兴起并推行的“三集中”措施。

21世纪初，苏南地区富裕乡镇开始出现小规模“农民集中居住”试验。由于苏南地区正处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大量中青年农民进城务工或经商，自然村落人口数量减少，变成所谓的“空心村”。当地基层政府便尝试把一些人口较少的自然村落撤并，集中到人口大村，或者集中建设一批公寓型居住小区，辅以相应基础设施配套。此举改变了农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和“屋内现代化，屋外脏乱差”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伴随着居住向社区集中，工业也开始向园区集中，原本分散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逐步集中到经济园区，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和分工协作的产业基地，这大大降低了企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以及原材料和产成品的物流成本支出，还减少了工业生产与农村发展的摩擦，有利于实现工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推动企业的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农业也向规模集中，原来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走向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之路，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特色经济。它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农业的生态、生活、增收三大功能，有利于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拉长农业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从而全面拓展农业发展空间、提高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集中整治之后的苏南乡村村落，空间外观布局有了显著的优化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其内部体系和功能特性也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变化，传统的熟人社会演变成“半熟人社会”。学者贺雪峰对此有一精辟的概括：“在半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已由熟识变为认识，由意见总是一致变为总有少数反对派存在，由自然生出规矩和信用到相互商议达到契约或规章；由舆论压力到制度压力；由自然村的公认转变到行政村的选任；由礼治变为法治，由无讼变为契约，由无为

变为有为，由长老统治变为能人政治。”^①不可否认，村落的转变过程充满着利益摩擦和文化碰撞，同时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这提醒我们需要关注乡村治理的基础条件，要求我们立足现实去加以考察乡村巨变。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我们才能避免受理念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尤其是避免受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同时，着眼于实践中未经表达的逻辑，正是我们用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的一条可能的道路。^②为此，本研究将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对城乡一体化背景之下的乡村治理加以分析，揭示其治理之道。

第二节 研究视角

实践发展历程表明，乡村社会治理远非人们头脑中想象的那样简单。无论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的农村改造运动，还是改革开放背景下开列的诸多乡村建设项目清单，实际都没有很好地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詹姆斯·C. 斯科特告诫我们，用失败来形容发展的灾难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解释这些20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背后所隐含的逻辑。而上述未取得令人满意效果的运动或项目留给世人的重要启示之一便是乡村治理或者改造必须建立在对乡村社会的充分了解和认识之上，外在制度嵌入要考虑乡村内生社会基础，并将两者结合起来。

一、乡村治理与国家的互动

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是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立场，焦点集中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以及如何重构公共权力的合法化权威来源。詹姆斯·C. 斯科特指出：现代国家总是力图梳理社会，使社会情况变得更加清楚，以便使国家更容易执行征兵、征税、治安等职能……^③通过反复梳理和渐进渗透，国家政权试图建立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将触角伸向它想要到达的地方。依据国家和社会在关系调整中的力量强弱、地位高低不同，存在四种常见的国家

① 贺雪峰.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2.

② 黄宗智.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J]. 中国社会科学，2005（1）：88.

③ 詹姆斯·C.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M]. 王晓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

一社会的关系模式：弱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乡村社会的发展前景与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强度有关。如果国家认为推动农业发展是更为务实、效率更高、震荡更小的选择，那么，国家就有必要依托合力的“强国家、强社会、强关联”的关系框架，沿着减少城乡差距和城乡一体化的方向，对村庄发展进行更多谋划和投入。^① 国家一社会视角立足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个不同的领域，展示的是现代化建设的宏观结构性条件以及可资获取的资源，它决定了乡村治理的现存空间及其资源限度，其主要缺陷在于忽略乡村治理中基于目标向善的多主体行动过程，缺乏由下而上的乡村自主回应反馈，最终无法应对乡村治理性危机，也容易得出片面的研究结论。因此，乡村治理在关注外部结构和可用资源的基础上，更主要的是要内部挖潜，理顺关系，形成强大合力。

二、乡村治理与市场的互动

乡村社会的转型离不开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在转型时期，乡村越来越被卷入市场经济乃至为市场社会所建构。卡尔·波兰尼对欧洲工业文明兴起的经济史研究表明：物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委托给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劳动力、土地与货币在虚构的帮助下得以组织起来变成纯粹的商品，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过去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现在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当国家政策向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加容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承担市场伴随而来的风险。当不受限制的市场所产生的后果变得昭然若揭时，人们会抵制它，会通过从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中抽身而退来挽救社会并使自然环境免于毁灭。^②

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集市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并不一概排斥市场元素，农村存在着相当发达的市场网络，农民有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需要、兴趣和能力。但是，詹姆斯·C. 斯科特关于东南亚农民道义经济学的研究以及舒尔茨关于农民与农业改造的研究等表明，一方面，农民对市场经济的态度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随着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农民对市场抱着一种安全

^① 毛丹，等。村庄大转型——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29-30。

^②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M]。冯刚，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18。

伦理学逻辑,当自身生存面临危机时会对市场经济做出各种方式的反叛,仅在勉强糊口度日条件下采取生产消费均衡模式,在条件具备时则接受和进入市场经济。因此,农民既被引向市场而表现出市场兴趣和市场能力,又有基于农业的弱势和农民的保守而实施多种自我保护的矛盾倾向。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印证了一个客观问题:农村的需要与资本的市场诉求之间是有距离的。例如,农村、农业都需要货币,但是进入农村、农业的货币资本可能带来农民承受不起的损害,将农民置于巨大的生存风险之中。农村资源流向城市,农村日益衰败,还有农村伦理价值体系的崩塌等,需要国家建立某些应急保障机制。由此可见,乡村和市场之间既存在亲近与结合的一面,又存在冲突与矛盾的一面,乡村治理不能撇开市场实践而空谈管理。市场(经济)因素是乡村治理过程的决定性变量之一。

◆ 三、乡村治理与社区的互动

城市发展大大推动了社会物质文明的繁荣进步,但也为此付出昂贵代价:乡村的停滞、落后,城市生活过度的两极分化、过度浪费资源和愈来愈脱离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种代价不仅抑制了乡村的发展,也抑制了城市的发展,社会的固有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必须探求新的城乡结构形态。^①消除城乡隔离,或者终结乡村的初始想法逐渐被城乡有机联系思维所取代。乡村治理的基础转到乡村与城市过渡形态的集镇社区之上,这是以乡村工业化为起点,在乡间的交通结节点、集市以及区和乡行政中心逐步形成众多的、为农村农业和农村工业服务的、作为城乡纽带的集镇社区。^②集镇社区是介于乡村与都市之间的过渡居民区,它的性质既不同于纯农业活动的乡村,也有别于纯工商活动的都市。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观点,集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③

对于苏南地区而言,推行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取消固有农业户口,建立以合法住所和稳定职业为准入条件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实施农村实事工程,解决交通、水电气供应、环保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力求形成“无缝对

① 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

② 黎熙元,现代社区概论(第二版)[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143.

③ 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8.

接”、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网络；合理配置城乡公共资源，统筹城乡服务管理，建立教育、卫生、养老、文化、社会治安等资源的共享机制，促进城乡公共事业均等化发展；完善促进就业政策体系，健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加大就业援助力度，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优化城乡就业环境等，全方位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处于衔接地带的集镇社区成为城市辐射的首选对象，并被赋予社区经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及新型社区（移民）定位等多重角色任务。新农村建设开始向合作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方向努力。社区与村民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奉献”关系，这种关系模式适应了社区民主化、生活伦理化的时代潮流，对现阶段农村社区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较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控制—监督”关系更适合指导当前乡村治理实践。^①“社区的迅速成长已经改变了社会治理的格局，而且为人们重构社会治理体系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②，通过“五脏俱全”的社区单位集中展现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问题，有助于我们全盘了解社会特征和文化形态。鉴于此，本研究拟在集镇社区层面上加以展开永联乡村治理分析。

国内已有学术研究在乡村治理由谁主导、乡村治理功用如何、乡村治理结构架设以及乡村治理困境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果，呈现出如下的特点：①注重联系实际，研究重心由政治民主问题转移到治理问题，从村民自治的外生性价值移向内生机制，围绕乡村治理实践及其暴露出的核心议题入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现实紧迫感强。②采取多维视角扫描，从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维学科视角对乡村治理议题做了政策探讨和实践经验总结，拓宽了乡村治理的研究视域，研究成果为村民自治政策的制定和学界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价值。③运用分类研究的基本思想，将全国乡村治理情况按照相应标准分成若干类型，然后观察分析各种类型化村庄的治理路径及其适用条件，这有助于深化公众对区域复杂乡村治理的认识，以及掌握全国乡村治理的大致轮廓。

当然，已有研究也还存在不足之处：其一，研究分析框架缺乏创新。乡村治理架构要么存在较大缺陷，难以避开抽象的制度化陷阱；要么就是缺少现实可操作性，忽略了重要关节及技术，故采用何种治理模式促进乡村社会

① 孔德斌，刘祖云. 社区与村民：一种理解乡村治理的新框架 [J]. 农业经济问题，2013（3）：40-47.

② 张康之，石国亮. 国外社区治理自治与合作 [M].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1.

的转型发展,我们尚需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分析框架。其二,乡村治理的内在基础研究有待深入。乡村治理研究要对乡村治理的内在运作逻辑进行解剖,重点研究乡村治理究竟是怎样展开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乡村运转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如何等,已有研究在这些方面深入不够。鉴于此,本研究拟结合典型个案研究,细致剖析乡村治理的运作机制和蕴涵机理,以求服务于基层治理实务。

第三节 研究设计

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Earl Babbie)指出:“研究设计就是设计一个发现某事物的战略,虽然设计的细节会因研究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必须尽量明确要发现的东西;第二,必须采用最好的方法进行研究。”^①乡村治理研究需要高度重视研究设计环节。

◆ 一、治理概念范畴

“治理”一词最早来源于1989年世界银行首创的“治理危机”概念,后来在公共事务管理、社会组织、权力制度等诸层面得以广泛应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做出权威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不同于统治,它具有如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②基于全球乡村治理模式的视野,乡村治理内涵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其一,能够动员政治支持,获得民众的广泛信任;其二,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满足村民的服务需要;其三,

①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基础 [M]. 邱泽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69.

②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能够有效地管理冲突，具有良好的冲突协调机制。^① 我国学者徐勇结合中国本土化情境认为：“治理是通过一定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对社会加以领导、管理和调节，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活动。它包括一是领导或统治者所发挥的作用；二是社会成员所扮演的角色。”^② 张润泽、杨华认为乡村治理是一种综合治理，它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元素都统摄进来，以更广泛、更宏大的视野观察农村生活，而不囿于单纯民主化治理的村民自治。^③ 综合上述对治理概念的若干界定，我们认为，现代治理具有以下几个显性特征：

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是各主体之间建立的良性合作性治理，它不再是单一的政府社会管理主体，而是各种社会组织、私人机构以及个体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力图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维护秩序，满足公众需求。

第二，治理内容的多元化。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众的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福祉，而不是仅仅为了统治集团的私利。

第三，治理手段的多路径。治理是一个协商、合作与上下互动的过程，它包括公共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协调，不单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下达过程。

第四，治理过程的阶段性。治理是全方位的系统工程，需要遵循小步走原则，循序渐进；需要不断探索，寻求适宜的发展路径；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炼精细化的社会技术，并将之不断充实到治理设计当中；治理过程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有着一定的时间轨迹。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力图形成“乡镇政权与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模式，即国家基层政权设立在乡镇，在乡镇以下的村组实行村民自治，做到政府政务与乡村事务分离，互不干涉，村治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达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讲，乡村治理的重心就是落在基层的村级治理。

① 周运清，王培刚。全球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的个案分析 [J]。社会，2005（6）：89-91。

② 徐勇。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 [J]。政治学研究，1997（1）：63-67。

③ 张润泽，杨华。转型期乡村治理的社会情绪基础：概念、类型及困境 [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1-13。

二、研究方式

乡村治理研究较为困难，除需要长时间持续的关注我们外，还需找好典型对象，选好适用方法。

1. 个案研究（Case Study）

本研究确定的关注对象是地处苏南地区的永联村。它位于苏州张家港市的东北部，隶属南丰镇行政管辖。发展起点上的永联村自身条件并不佳，是从长江江湾里围垦出来的一片荒滩，地势低洼，涝灾频发，是苏南地区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的乡村村落。改革开放之后，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在村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永联村民弘扬“敢破敢立、自强不息、团结奉献、实干争先”精神，打破“以粮为纲”的思想禁锢，挖塘养鱼兴办副业；冒着“割尾巴”风险，卷起裤脚以做“无米之炊”的气概办钢厂；探寻“以工补农”的发展道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坚持共同富裕，主动合并周边村庄，谱写出“以工兴村，以钢强村”的发展篇章。昔日的穷村跃升为苏南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富裕乡村，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多项桂冠荣誉。工业化的牵引，带动城镇化，进而全面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永联村正以居住方式城镇化、生产方式产业化、生活方式市民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管理方式规范化、收入方式多元化，实现着由传统村庄向“中国永联”现代集镇的转变，成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农村大地上的现实样本。目前，全村98%的村民实现集中居住，98%的耕地实现集体流转，98%的劳动力实现就业，98%的村民享受到比城市居民更优越的福利保障。如图1-1所示，在10.5平方千米的村域范围内，小镇水乡（2万人）、现代工厂（占地近6000亩）、高效农庄（占地8000亩）、文明风尚，构成一幅“中国特色农村现代画”。我们认为，永联集镇社区既符合现代城镇的功能定位，又能体现乡村元素的功能要求，已成为乡村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散居型村落，它代表着乡村发展的未来景象。